

#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与认识升华<sup>\*</sup>

朱鹏华 王天义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建构起“三维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创新，使公有和非公、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三维“坐标方向”，从确立并存发展，到向着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这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生产关系运动规律构建了更加全面和科学的“坐标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系列显著优势，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朱鹏华（1982-），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山东济南 250100）；王天义（1954-），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北京 100091）。

##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统一的重大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中，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sup>①</sup>。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规定着该社会生产、分配、交换的基本原则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是该社会的基本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sup>②</sup>这是总结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经验，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从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同义语。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sup>③</sup>。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发展和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sup>④</sup>。社会主义基本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20ZDA01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研究”（17ALJ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5-77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③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④ 参见刘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2日。

经济制度由“一维”的生产，扩充为“三维一体”的生产、分配和交换（运行机制），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是一次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统一的重大成果。因此，从理论、实践和制度的辩证统一的角度，科学、客观、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和认识升华，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二、理论创新：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了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指明生产是出发点和决定因素，同时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即“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sup>①</sup>。由此可见，党的十五大从生产出发，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种“一维”的界定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拓展为生产、分配和交换（运行机制），“三维一体”的格局使得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全面和科学。将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种改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内涵的阐述，必须回归这一理论演进的历史，并从中梳理出理论发展的逻辑。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从改革探索到完善深化，再到成熟定型。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有机统一，其核心是将公有和私有、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从相互对立转向有机统一。

### 1. 所有制：由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个体经济的兴起，开启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sup>②</sup>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有经济存在的价值，将个体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sup>③</sup>，同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sup>④</sup>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对个体经济，存在大量雇工的私营企业的出现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争鸣。对此，党中央最初采取了“看一看”的策略，鼓励基层群众的实践创新。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sup>⑤</sup>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标志着私有经济补充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9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0-841页。

③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用的地位得到确立。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sup>①</sup> 这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公有和私有并存发展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且应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共同发展”从过去的“方针政策”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强化了并存发展的理论定位。2012年，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定位，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均能公平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功能上，明确“两个都是”的定位；在产权保护上，提出“两个不可侵犯”的要求；在政策激励上，强调坚持“三个平等”；在实现形式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发展非公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sup>②</sup>。这标志着开始突破公有和私有并存发展的认识，向着有机统一的方向演进。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将“两个毫不动摇”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当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已基本建成，这使得公有为主、公有和私有共同发展的理论定位逐渐清晰。

## 2. 分配制度：由单一按劳分配转向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改革开放之初，打破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着重提高经济效率成为建立新分配制度的理论探索起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伴随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按照科技知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生产资料等要素分配的现象开始出现。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这些非劳动收入均给予肯定，并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强调“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sup>③</sup>，这标志着对公平和效率相互关系的理解有所突破，且注重提高效率。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sup>④</sup> 这标志着在分配制度中公平和效率二者兼顾的确立，且效率先于公平。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我国收入差距快速扩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sup>⑤</sup>。随着我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二者兼顾定位中公平的地位逐渐被提升。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列为影响我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强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明确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②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15、517页。

③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④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4页。

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12页。

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sup>①</sup>。“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的提出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调整奠定了基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在着重保护劳动所得的同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表明，随着收入分配改革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对公平和效率二者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开始向着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向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坚持“两个同步”，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以及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当前，在共享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引领下，初次分配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再分配通过有为的政府作用，共同推动分配领域向着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向发展。

### 3. 经济运行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之初，从重视价值规律、放开个体经济入手开启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探索，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有关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传统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是对立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随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的一次飞跃，为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消除了计划与市场“主辅”差别，标志着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所突破。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两个不等于”，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等重要论断，从根本上消除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姓“社”姓“资”的理论困惑，为确立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平衡并用奠定了基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sup>②</sup>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演变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课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原则和框架进一步具体化。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进行了具体安排，进一步深化了对政府和市场二者关系的认识。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sup>③</sup>，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认识持续发展和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科学定位”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①</sup> 并强调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科学定位政府的职责和作用。

事实证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将有效的政府治理与市场作用有机地融合起来，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sup>②</sup>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进历程表明，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是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三维“坐标轴”。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维度中，所有制是核心，发挥着支配和决定的作用，其中公有制为主体凸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分配制度是关键，发挥着激励和强化的作用，其中按劳分配为主体凸显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载体，发挥着经济运行和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基本定位。“三维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生产关系运动规律构建了更加全面和科学的“坐标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 三、认识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曾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③</sup> 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识别更具优越性和生命力的基本经济制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世界就一直处于“一球两制”的格局，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失利了，以英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破产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 1. 从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史看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迄今为止，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史，也是一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史。世界上曾经实践或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初始条件下，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如何建立一个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世界难题。

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迅速建立起“军事共产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过两年多实践证明，这种制度虽然有效地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但它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列宁正视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不足，果断“战略退却”到“新经济政策”，相应地基本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革。1924年以后，斯大林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以“社会主义计划化”为核心，建立了“公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德国法国西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13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效仿苏联建立起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其僵化的制度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未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其弊端和矛盾不断显现，改革成为苏东国家必然的选择。

从实践上来看，苏东经济改革比较典型的是南斯拉夫、苏联和匈牙利。1950年，南斯拉夫率先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力图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其核心是在公有制（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工人自治、分散决策、市场调节，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sup>①</sup>。但这种特殊形态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实现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也没有建立成熟有效的经济制度，虽然前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也开始了改革探索。赫鲁晓夫先从农业再到工业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未能成功，且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导致最后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后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趋于停滞；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夫两位后继领导人由于年老体弱且执政时间很短，在改革方面均没有大的作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旧经济制度已经积重难返，他没有确立创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正确方向，而是放弃了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苏联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争论和斗争中解体。1956年，匈牙利开始“静悄悄的革命”，目标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进而形成不同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但是改革并未持续多久，后因苏联干涉又回到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1968年，匈牙利开始建立“新经济机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计划和市场的“混合”，最终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sup>②</sup>。

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源于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经济决策的失误，与经济制度无关<sup>③</sup>。实践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近40年的经济改革，基本处于“改革—失败”的循环之中，经济改革陷入“体制陷阱”，而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发生真正的革新。苏东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没有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制度，最终走向了改旗易帜的邪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放弃了共产党领导，在改革中没有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2.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看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的泥潭。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衰败，新自由主义复苏。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演变并具体化为系列的国家经济策略，从英美发达国家向世界各国蔓延。这其中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最具标志性，对包括拉美债务危机国家、苏东转轨国家在内的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和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sup>④</sup>。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是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政策，但其本质是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宣布实行市场经济，曾经旷日持久改革失败的经历，使大多数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选择了通过激进的“休克疗法”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每个国家改革的路径各不相同，但改革的目标都指向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① 参见孙秀峰：《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蔡国江：《对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反思》，《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参见王金存：《从世界经济看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制度的生机》，《世界经济》1992年第5期。

④ Moises Naim, "Fads and Fashion in Economic Reforms: Washington Consensus or Washington Confusion?", *The World Quarterly*, Vol. 21, No. 3, 2000.

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看似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其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各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就是有力的证明。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见表1），1991—2019年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sup>①</sup>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人均GDP仅增加了1.32倍和0.25倍；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7%和0.98%，既远低于我国（8.75%），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3.25%），特别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0.98%）还低于低收入国家（1.15%）和世界平均水平（1.51%）；除了剧变转轨初期的经济下滑，2000年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经济均出现了负增长。这些数据证明，从经济发展效率和稳定性来看，苏东转轨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30年的探索和重建，已具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周期性危机的弊端。

表1 人均GDP年增长率（%）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低收入国家	-2.31	-5.18	-3.15	-3.19	1.81	1.98	1.90	0.73	0.54	0.10	2.28	1.38	2.19	2.73	3.96
中等收入国家	-0.48	-0.82	1.06	0.77	1.92	3.26	3.32	0.52	1.79	4.20	2.05	2.96	4.11	6.40	5.71
高收入国家	0.66	1.44	0.43	2.45	2.02	2.29	2.66	2.07	2.62	3.40	0.90	0.91	1.55	2.66	2.18
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	-5.06	-0.62	1.57	0.70	3.13	5.16	2.33	2.82	2.00	4.54	3.59	4.00	4.03	6.04	4.98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6.25	-14.26	-9.47	-13.56	-5.03	-3.20	1.84	-3.38	5.56	9.44	6.23	5.46	7.88	7.99	7.01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1.61	0.72	1.96	2.82	-0.16	1.84	3.47	0.65	-1.37	2.29	-0.53	-1.06	0.23	4.99	2.96
中国	7.81	12.82	12.57	11.78	9.75	8.78	8.12	6.81	6.74	7.64	7.56	8.40	9.35	9.46	10.74
世界	-0.23	0.20	-0.03	1.46	1.49	1.91	2.22	1.15	1.87	3.02	0.65	0.89	1.68	3.11	2.64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低收入国家	3.77	4.59	3.59	2.12	3.02	0.61	-0.24	3.07	2.42	-0.46	1.27	1.73	0.96	1.22	1.15
中等收入国家	6.61	7.18	4.31	1.14	6.22	4.78	3.96	3.92	3.26	2.79	3.13	3.78	3.54	2.88	3.25
高收入国家	2.40	2.05	-0.37	-4.01	2.29	1.40	0.71	0.88	1.43	1.76	1.15	1.88	1.83	1.24	1.48
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	6.53	6.48	4.76	-2.39	1.97	3.19	0.74	1.48	3.11	4.21	3.37	4.91	4.63	3.88	2.97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8.84	8.80	4.73	-7.33	4.26	4.33	3.46	1.90	0.60	-1.99	0.17	1.96	2.63	-0.11	0.98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3.99	4.26	2.71	-3.00	4.68	3.21	1.67	1.69	-0.06	-0.92	-1.32	0.80	0.63	-0.10	1.33
中国	12.09	13.64	9.09	8.86	10.10	9.03	7.34	7.24	6.88	6.50	6.27	6.35	6.27	5.73	8.75
世界	3.10	3.05	0.61	-2.86	3.06	1.95	1.32	1.46	1.65	1.69	1.41	2.10	1.97	1.39	1.5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KD.ZG>，部分数据经作者计算所得。

20世纪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中的部分拉美国家选择了新自由主义抛出的“华盛顿共识”，变革了本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但事实表明，这些国家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改革，并没有带

① 不包括原民主德国，因两德合并后，统计数据也合并。

来经济健康发展，而是危机不断，同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比如，墨西哥1994年爆发金融危机，巴西1999年爆发金融危机，阿根廷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从表1来看，1991—2019年拉美国家有9年出现负增长，占比近1/3，危机发生率既高于苏东转轨国家，也高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3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1%），更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25%）。这些数据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带来的是低效率且充满危机的经济制度。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开放型的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1997年）和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以“华盛顿共识”为政策外衣的新自由主义早已从神坛上跌落下来<sup>①</sup>。虽然近年来，西方国家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华盛顿反思”，对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政策主张不断微调，但是其核心的观念和理论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sup>②</sup>。从实践上来看，它们的制度基础仍然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它们改革的目标仍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创造必要的制度体系。以苏东、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在的弊端和矛盾无法自我革除。对此，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和失灵的论述也是很好的证明材料。

### 3. 从我国经济发展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弗朗西斯·福山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这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巨大的制度优越性。

一是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健康快速增长。生产力标准是判断基本经济制度优越与否的首要标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1978—2019年我国GDP由3678.7亿元增至988458.0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42%，远高于同期世界2.92%的年均增速；我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78年1.74%上升到2019年的16.34%，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由1979年2.07%上升到2019年33.37%，当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201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355.04亿元增至315504.75亿元，1983—2019年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约2.17万亿美元，截至2018年我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1.98万亿美元。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货物贸易、制造业均居世界首位。

二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民生保障和改善水平是判断基本经济制度优越与否的关键标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78—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30732.85元，消费水平由183元增加到27563元，恩格尔系数由65.9%下降到28.2%；城镇化率由17.92%增至60.60%，超过5.97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镇；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贫困发生率2019年已降至0.6%，贫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7.6亿人，城乡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事业已取得全面发展，

① 参见周建军：《从“华盛顿共识”到“包容性增长”：理解经济意识形态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参见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sup>①</sup>。

三是我国社会大局始终保持和谐稳定，成为最具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社会安定是判断基本经济制度优越与否的基本标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提高治理效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乱象不断，比如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福利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动荡不安。反观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经济健康发展，贫困基本消除，国家治理有效，社会安定团结、充满活力、和谐有序<sup>②</sup>。

四是整合经济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判断基本经济制度优越与否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形成整体合力。从“两弹一星”工程，到载人航天“天宫”和“天舟”工程、射电望远镜“天眼”工程、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等；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到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脱贫攻坚、生态环境治理等；从1998年抗洪抢险，到2003年抗击“非典”肺炎疫情、2008年抗震救灾、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这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五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合作、共赢是判断基本经济制度优越与否的时代标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近年来，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这表明资本主义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开始背道而驰<sup>③</sup>。与此同时，我国举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sup>④</sup>，这一重大转变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和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sup>⑤</sup>。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制度，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优劣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和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其基本经济制度是否符合自身国情。

#### 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中，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又称为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事实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经济领域的显著优势，就是“三维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数据经作者计算。

② 参见张维为：《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制度原因》，《求是》2017年第15期。

③ 参见姜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⑤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发挥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过程，就是推进“三维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一直围绕着公有和私有、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进行理论、实践和制度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确立了单一公有制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后，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方针和政策，突出公有和私有、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的互补性、协调性与统一性，成功地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逐渐在理论和实践上向着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这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一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将公有和私有有机统一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来；二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机统一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上来；三是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充分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提高各类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将有为的政府调控和有效的市场机制有机统一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来。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推动着认识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从将市场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面，到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发展和深化已被融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之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在新时代国内和国际治理的大棋局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认识升华，才能将其显著优势发扬光大。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 [2] 胡乐明：《以总体性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 [3] 顾海良：《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 [4] 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 [5] 姜辉：《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 [6] 杜奋根、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继承性发展——兼评三种流行的谬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 [7] 葛扬：《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 [8] [美]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编辑：黄华德)